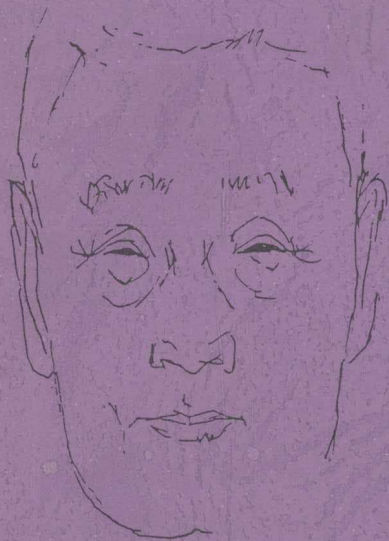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



张中行卷

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
同也坐在篱下的老朽们，或
年不老而愿听听旧事的人们，
谈谈记忆中的一些影子。

——张中行



张中行卷

王湜华 乔继堂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

张中行卷

王湜华 乔继堂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4插页 238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314-X/I·269

定价：13.80元

读《负暄续话》

启 功

张中行先生比我长三岁，在科举制度时，相差一科，在学校制度中，相差一届。他的学问修养，文章识见，都不折不扣地是我的一位前辈。我们相识已逾四十年，可以算是一位极熟的神交。一般说，神交二字多是指尚无交往而闻名相慕的人，我对张老何以忽然用上这两个字？其理不难说明：住得距离远，工作各自忙。张老笔不停挥地撰稿，我也笔不停挥地写应酬字。他的文章出来，我必废寝忘食地读，读到一部分时就忍不住写信去喝采或抬杠。他的著作又常强迫我用胡说八道的话来作“序”，说良心话，我真不知从何写起。“口门太窄”，如何吐得出他这辆“大白牛车”？但是翻读这部《续话》稿本未完，就忍不住要写信去喝采、去抬杠。罢了，就把一些要写信的话写在这里，算作初步读过部分原稿的“读后感”。还得加个说明，为什么用“感”字而不用“记”字，因为“记”必须是扎扎实实地记录所读的心得体会；“感”就不同了，由此的感受，及彼的感发，都可包容。也就是有“开小差”的退路而已。

张先生这部《续话》中有一篇记他令祖的文章，题为《祖父张伦》。文中开头即说世间有两种人，一是哲人，一是痴人。哲人如孔子，痴人如项羽。其论点如何，我这里不想阐发，所

要引的，即因我对张老总想用“徽号”般的词来概括他，又总想不出恰当的字眼；现在得到了，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哲人最明显，从我肤浅的理解中，作武断的分析：他博学，兼通古今中外的学识；他达观，议论透辟而超脱，处世“为而弗有”；他文笔轻松，没有不易表达思想的语言；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他的杂文中，常见有不屑一谈的地方或不傻装糊涂的地方，可算以上诸端升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哲人的极高境界。

至于说他也是痴人，理由是他是一位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在学校教书，当然是教育工作者，他后来大部分时间作教育出版工作，我读过他主持编选注释的《文言文选读》，还读过他的巨著《文言和白话》，书中都是苦口婆心地为学习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人解决问题、引导门径。那部选注本，从每个词的解释，到每个字的规范写法，以至每个标点的使用，可以说都是一丝不苟的。第一册刚出版，他手持一本送给我，一句自谈甘苦或自表谦逊的话都没说，回忆仿佛只说是大家的辛劳而已。我也曾参加过这类选注本的工作，出版后送人时就不是这种态度，对照起来，我只有自惭，想把书中所列我的名字挖掉。

再说一本题为《文言和白话》的巨著，这真可谓马蜂窝，一捅便群蜂乱飞，是个总也捅不清的问题。而张老却抱着大智大悲的本愿，不怕被螫，平心静气，从略到详，还把有关弄懂文言文的种种常识性问题一一传授。张老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而这本书的文风却极似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前辈叶圣陶、吕叔湘诸先生的著作，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还有在解放前后许多年中，张先生曾主编过有关佛学的期刊，不难想象，在那个时候，这种内容的刊物，撰稿人和读者

是如何稀少，而张先生却不惜独自奔走约稿，甚至自己化名写稿，以救急补充空白。据我所知，张先生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他又为什么这样甘之如饴呢？恐怕除了从传播知识的愿望出发之外，没法有别的解释。

他去年还写了一本《禅外说禅》，顾名思义，既在禅外，必然是持着旁观态度。虽未必全是从唯物论角度来作批判，至少也会是拿那些不着边际的机锋语来作笑料或谈助，谁知却有不尽然的。他在稿中仍是源源本本介绍宗门和教派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些是老禅和子也未必都知都懂的，而书中则严肃地、不涉玄虚地加以介绍。不涉玄虚恐怕就是“禅外”二字所由命名的吧？

从以上各点看，他的著作总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的。如果说有一种信念或说一种特别宗教的话，就可说他是“教育教”的虔诚信徒。这样虔诚，我无以形容，只可用张先生所提出的那个“痴”字来恭维他，此外别无他法。

现在该回到《续话》的本身上来了。张老在《琐话》中，对温源宁先生的学识文章都表示过赞扬，最近他亲自送来《续话》稿本，命我作“序”，同时手持一册题名《一知半解》的小册，即是《琐话》中提到的温氏那本作品。原本是用英文写的，《琐话》援引时是张老自己译的一段。现在这本是由南星先生把全书译成汉文，前有张老的序言。我一口气地读完全书十七篇，感觉到难怪张老那么欣赏这本书，除了原本英文的优点我不知道外，作者那种敏锐的观察，轻松的刻画，冷隽的措词，都和张老的散文有针芥之契。

我曾对观察文学艺术作品设过一种比喻，要如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现在还要加上两句，即是在一

定空间里看他的神情，在一定时间里看他的行为。我觉得温先生这本书，写他所见的人物，可以说具备高度水平，而在我这个初学的读者，仍是一项先天不足处。温氏书中所写人物，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作者既没有交代，译者当然也无法一一注明。书中的人物虽然个个写得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但是捉来的这位鬼魂，竟使阎王爷也需要请判官查帐。

张先生《琐话》、《续话》这两部书当然也具有那种勾魂摄魄之功，更重要的还有不屑一写的部分和不傻装糊涂的部分。这两部分是温氏所不具备的，因为这是哲人笔下才会出现的。或问：你有什么例子？回答是：孺悲要见孔子，孔子托词有病不见他，传话的刚出房门，孔子就取瑟而歌，让孺悲知道，这是不愿跟讨厌的人费话，岂不即是不屑一说吗？又子贡方（谤）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不谤人是道德问题，而孔子以没时间来表示不愿谤人，多么幽默，也就是多么不傻装糊涂！

张老的《琐话》和《续话》里又有另一个特点不同于温氏的，就是写某人某事，必都交代清楚，使读者不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憾，这仍是“教育教”信徒的职业病，是哲人写书时流露出的痴人性格。为冷隽而冷隽，或纯冷无热的，当然可算纯哲人，而张先生却忍不住全冷、冰冷，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其实他的冷，也是被逼成的。所以纯俏皮的文章，是为俏皮而俏皮；冷中见热或热中见冷的文章，可以说是忍俊不禁。

有人看我写到这里向我说：照你所说的这位张先生可谓既哲又痴的完人了。我说不然，他实是痴多哲少，因为他还是一

笔一划地写出了若干万字的著作！

“读后感”写到这里，还要加一句声明：这是读完稿子之后写出的，理应放在卷末，但我又无排版权，被放在何处，我是无法作主的，只有向我和作者共同敬爱的读者说：“我没敢作序！”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

目 录

读《负暄续话》(代序)	启功
黄海闻	(1)
熊十力	(5)
胡博士	(10)
刘半农	(15)
刘叔雅	(19)
顾羨季	(22)
刘佛谛	(28)
辜鸿铭	(32)
梁漱溟	(44)
俞平伯	(50)
启功	(59)
季羨林	(72)
老温德	(78)
张守义	(84)
丁建华	(91)
王门汲碎	(97)
银匣人物	(102)

怪物老爷	(106)
汪大娘	(112)
柳如是	(117)
顾二娘	(123)
红楼点滴(一)	(130)
红楼点滴(四)	(134)
沙滩的住	(138)
沙滩的吃	(143)
香冢	(147)
大酒缸	(150)
药王庙	(153)
起火老店	(160)
历下谭林	(165)
青龙湾	(171)
神异拾零	(178)
慧星	(181)
直言	(186)
关于贤妻	(192)
自嘲	(198)
闲话古今	(205)
梦的杂想	(214)
蓬山远近	(219)
代步	(225)
左撇子	(232)
错错错	(238)

剥啄声·····	(242)
晨光·····	(246)
常言道甚解·····	(250)
冷与热·····	(254)
也来一篇四书文·····	(257)
“人心不古”云云·····	(260)
书·····	(264)
信·····	(273)
日记·····	(279)
城·····	(284)
桥·····	(288)
户外的树·····	(293)
螳螂·····	(297)
蟋蟀·····	(303)
食无求饱·····	(308)
挟车驴背·····	(315)
难得糊涂·····	(320)
一方闲章的联想·····	(328)
自省·····	(333)
自欺而不欺人·····	(337)
临渊而不羡鱼·····	(341)
失落·····	(347)

黄 晦 闻

一九三五年初，我还没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六十四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等。他旧学很精，在北京大学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

《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

就这样，他怀着满怀悲愤，虽然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多不能自立，于是卖遗物。据马叙伦先生说，单是存砚有二十六方，都卖了。其他东西可想而知。记得是三十年代末，旧历正月厂甸的文物摊上，有人看到黄先生的图章两方，一方是“蒹葭楼”，

另一方是什么文字忘记了，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但没有碰到，也只能任之了。有时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看第一种，戴东原（震）著的《原善》上下两卷，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时黄先生才三十四岁。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是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有一种，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辞，计两则。第一则是：

安化陶文毅集诸家注靖节诗，云汤文清注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后得见吴騫拜经楼重雕汤注宋槧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云。此本予于庚申（案为1902）四月得之厂肆，盖即吴氏重刊宋槧本。书中于乾隆以前庙讳字多所改易，而莫氏《邵亭书目》，云有阮氏影宋进呈本，未知视此本何如也。黄节记。（原无标点，下同。下钤长方朱文印，文为“黄节读书之记”。）

翻到后面有第二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有吴正传诗话、黄晋卿笔记，字画结体与此本不同，而行数字数则全依此本。意者此或即阮氏影宋进呈本欤？庚申十二月十八日。（下钤朱文小方印，文为“蒹葭楼”。）

字为楷体，刚劲工整，可谓书如其人，想保存一点先师手泽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说也凑巧，此后不久，游小市，在地摊上看到黄先生写的赠友人的条幅，装裱齐整，因为不是成铁翁刘，没有人要，只用一角钱就买回来。写的是自作七言绝句，题为《官廨梅花》，推测是在广东时所作。字为行楷，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马叙伦先生著《石屋余渾》，《米海岳论书法》条说米自己说，得笔要“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黄晦闻书》条说黄先生议得“骨、筋、风、神”四面，也就是还缺少“皮、肉、脂、泽”四面，我想这是当行人语，很对。且说这件字条，十年动乱中幸而未失。有一天，大学同班李君来，说黄先生给他写的一件却没有闯过这个难关，言下有惋惜之意。我只好举以赠之，因为我还有陶集并题辞，即古人“与朋友共”之义也。

熊 十 力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

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